

西安事变

纪实

申伯纯◎著



XIAN SHIBIAN
JI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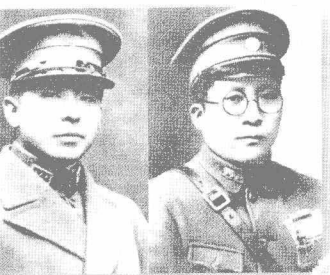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西安事变

纪实

申伯纯◎著



XIAN SHIBIAN
JISHU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柏裕江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1-007434-4

I. 西… II. 申… III. 西安事变(1936) IV. K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620 号

西安事变纪实

XIAN SHIBIAN JISHI

申伯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2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6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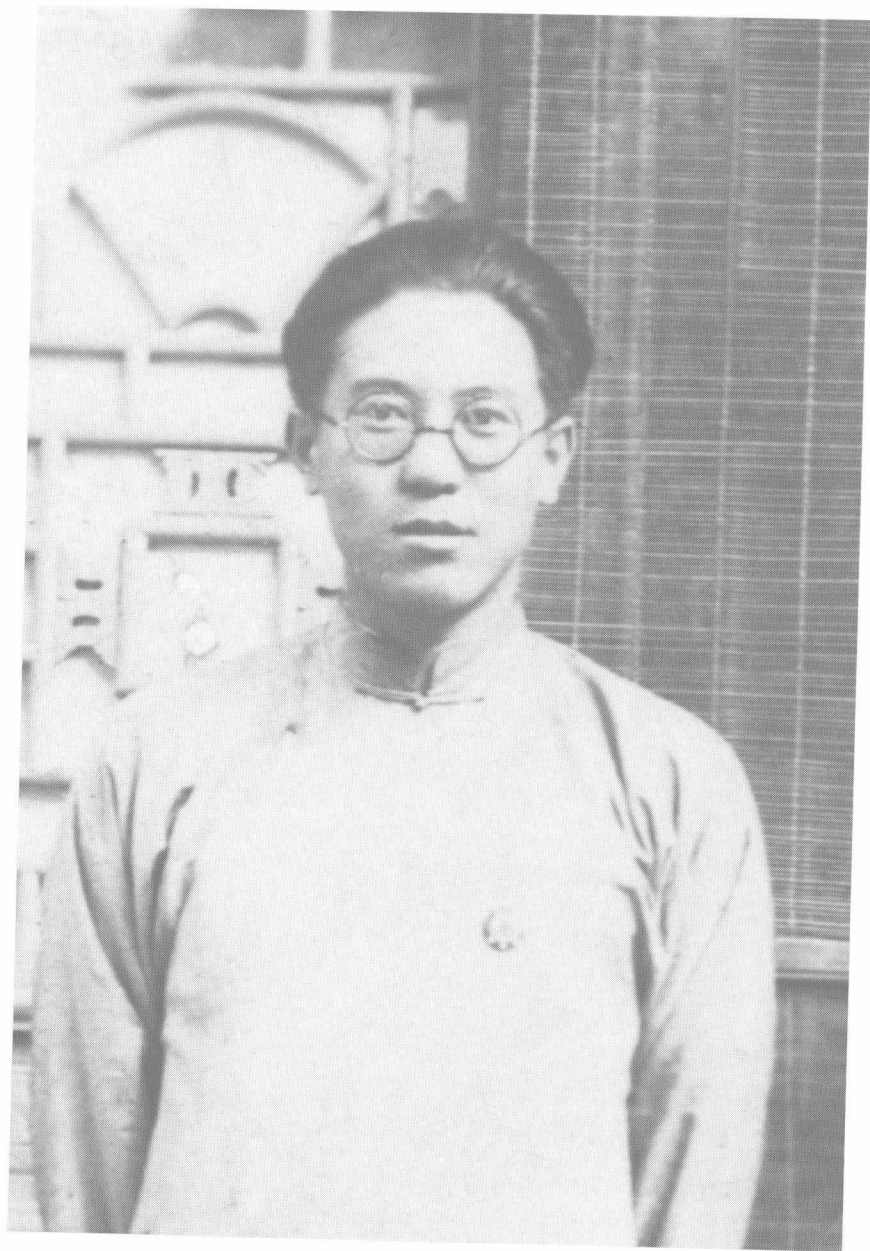
ISBN 978-7-01-007434-4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申伯纯 (1899~1979)



在北京大学参加平民教育演讲团



1936 年与夫人女儿在西安

綏署政治處長申伯純講詞

實現救國主張仍有多方面保障

蔣必施用威權驅逐漢奸親日派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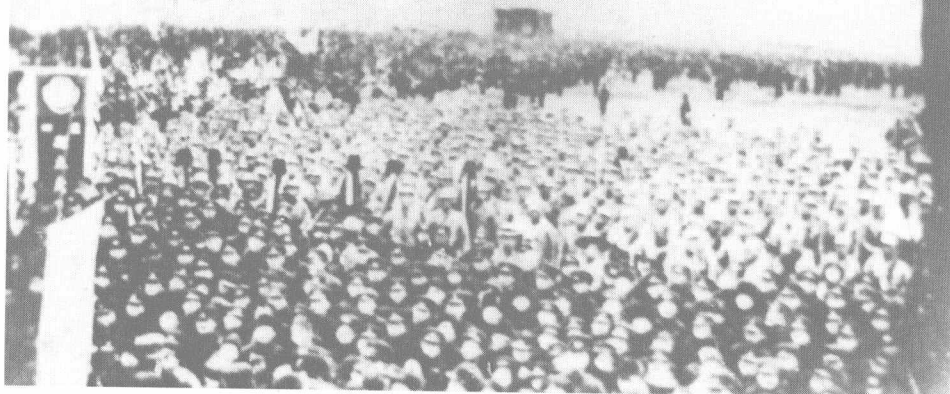
上發他。不，走過大家對蔣氏以爲是縱虎歸山，後患無窮；還有一種人說要把戲；很多的批評，其中最主要的批評：即具最無保障；但我們考慮多時，以爲這步走，是很有保險的；假不退專行不通，蔣拿手，辦、南京不辦，即使實辦，還是賄迫，作罷要後悔的，改組政府撤，可以再來，這種先實行容納條件的辦法，實在不行通。

第三項，保衛三鎮國策第一險，聯合抗戰路綫，蔣氏照此路線走，國家有救，不然也踏亡了。第二項，蔣氏個人人格信譽的保障，蔣氏在此，我們恭敬地，他誠懇反悔，敢否？他回南京，交給他的人格保證，信譽地位，決不至出此。第三項，北平軍政七區，革命軍及土匪軍隊，重慶形成了極偉大的力量，所以所能而摧毀的是：南京以說放蔣氏再走，有多方面保障。再有人說放的早了，應多留幾天，分給各鄉鄰，不時，使他走，如如此情形，再把他走，以至反悔。但照原設想，這是大錯，將蔣氏破裂了，蔣氏回來，起來，緊組織我們的羣衆，督促政府的下配合自然很迅速可實現云。

申定議至此大眾選派先生繼向漢口西斯格主義，極合於我國必須放棄蔣氏回京行使該要求條件，我們人民在後方，必須加緊宣傳，我們的正課要求，加倍督促政府的下配合自然很迅速可實現云。

1936年12月30日《西京民报》:《绥署政治处长申伯纯讲词》

双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1936年12月16日西安各界民众大会支持张杨兵谏

弟今平同端帶一未漢口為目
 前救危局勿為孔國計商
 定指法二則一先連下最
 大決心使 貴府及弟易收
 決甘之向 關於改組政府及
 對日問題 可至之中全全提
 出公開討論 向于兩軍 兄
 等速即商討下最後果斷
 以有意見補充先賜 常談
 以人更賜未一軍長 兄等
 張不三舉之一等名問題那
 是更收賜印 表不愛命
 弟等告弟 十七日限 賜
 兄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詳
 計之 凡有利於國者弟
 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賜
 勿才為我個人謀計 西
 部雲天 各任期賜 特
 音 弟良書 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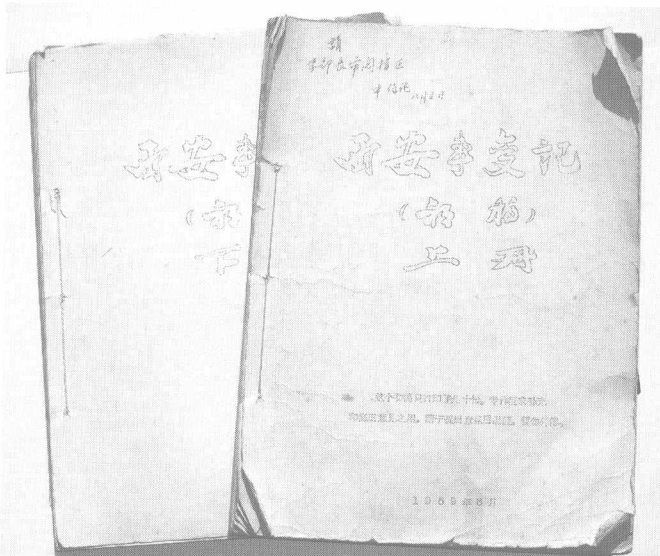
1937 年 1 月 13 日张学良给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信



1937 年 6 月杨虎城出国前在南京(右一申伯纯、右二李志刚、右三杨虎城)



八路军前总夕阳台阵地(右一申伯纯、左一李达、左三滕代远)



1959年《西安事变记》初稿



1946年12月13日《冀中导报》：《回忆双十二》

再版前言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当年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如果活着，差不多都是过百岁的老人了。父亲就是一个西安事变的亲身参加者，如果活着，今年110岁了。

父亲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怀有报国志向，毕业后赴广东汕头参加大革命。1927年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离开广东，投奔西北军，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与重用。1934年春，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父亲认清要想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毅然决然排除一切困难，参加了革命，为党做地下工作。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1月初，父亲奉地下党领导南汉宸之命去南京见杨虎城，首次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并提出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12月，父亲将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示与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同意。1936年2月，杨虎城与党的代表王世英、汪锋在西安就两军停战、合作抗

日、建立交通站等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从此杨与陕北中央建立正式关系。此后,父亲一直在杨虎城身边,1936年2月,杨虎城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任父亲为交际处长,开展对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同时进行秘密联共抗日的活动。

12月12日清晨,捉到蒋介石后,在新城大楼,张学良对高崇民和父亲等人说:“现在全中国的命运在我们手里攥着,我们不能胡闹,我们要对全中国人负责!你们马上要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善后问题,对我和杨先生两人负责。”

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杨虎城又任命父亲为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

12月14日,西安各界在南苑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两千多人,由父亲代表设计委员会作报告,宣讲这次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到会群众反应非常热烈。父亲还向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连排级以上官佐作过几次同样的报告。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29日,在西师大礼堂,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召集学生开会,到者约千余人,要求当局对蒋介石回京一事进行解释,西安军委会(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特派父亲——绥署政治处长参加。父亲即席讲演,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宗旨解释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和放蒋的保障条件,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调遣大军威胁西安,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日益激剧的分歧和斗争。父亲遵循党的指示,坚决主和,反对战争,因此险遭极端者的暗害。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为稳定西北局势,曾给包括父亲在内的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写信:“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

性,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在党的英明决策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历史由此转折。

1937年3月,叶剑英找父亲谈话,中央批准,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会议长、一二九师情报处处长、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副处长、华北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军调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华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曾任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政务院办公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问等职。

父亲的一生轰轰烈烈、多姿多彩,可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为人耿直,敢说真话,在“左”倾思想影响的时代,父亲的命运不免会有坎坷。父亲对党和革命事业是绝对忠实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带领全家及周围的人参加革命。他的房产捐献给了组织,他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1940年牺牲在延安;二儿子22岁就当上了延安的特等劳动英雄,后成为中国雷达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解放后,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父亲都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父亲亲身参加西安事变,一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亲知亲闻的有关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只是长期的战争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使他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直至1955年,父亲到政协工作后,公余有暇,才开始着手进行。

1956年6月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两年以来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想以西安事变作题材写一本长篇的统一战线小说。我想这在统战工作方面和文艺工作方面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一工作是极艰巨的。为了准备做这一艰巨工作，两年以来我曾读了不少中外文艺的书籍。我也曾就我记忆所及写出了一些有关的西安事变的史料和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个工作我准备做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长期打算，也准备作为我一生有价值的贡献。”

1956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的座谈会上，周总理称张学良、杨虎城是“大有功于抗日事业”的“千古功臣”，号召有关同志写文章。在总理的支持下，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他在自己的回忆的基础上，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进行采访，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到卫立煌、邵力子、李志刚，有记录可查的就有二十余人。同时父亲还查阅了大量的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中央所存档案资料。

1959年夏《西安事变记》初稿完成，送交领导和相关人士审阅，征求意见。叶剑英说：“这是一件大事，张学良对党有功，现在写出来很有好处。”范长江评价：“第一手资料，权威资料，搜集这样多的资料真不容易，真是内幕核心的资料，可以藏之深山，垂之永久。”

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全国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父亲任副主任委员，主持日常工作。父亲贯彻总理“把亲身经历留下来，传给后人”的指导思想，广征博采，充分调动了各界人士的积极性，稿件如潮水般源源涌来。仅在父亲工作时期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五十五辑，并留下了三亿字的历史资料原始文稿。《文史资

料选辑》不久就显示了它的特殊作用,在国内外久负盛名。

1961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纪念25周年之际,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西安事变参加者,宴后决定成立九人小组和七人小组编写西安事变史料:(九人)包括李维汉、林枫,(七人)为刘鼎、申伯纯、高崇民、阎宝航、赵寿山、南汉宸、杨明轩。七人小组以申伯纯为召集人,由刘鼎负责审查。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收集了二百万字。

1960年至1962年,父亲根据不断收集到的材料以及各方面意见,对《西安事变记》进行第一次全面补充修改:“这次修改西安事变记的目的有三:1. 落实,将虚假的去掉,将空虚的填补起来。2. 求平,将歪的邪的去掉,求正求平,去掉一些杂质,使它内容更纯正。3. 更好地组织起来,如设章。这次修改拟完成下述三点:1. 更深刻正确的论断。2. 把偶然的事件从内在的联系找出它的必然性来。3. 尽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观点去分析这个事变。”经过两年的努力,1962年5月《西安事变记》二稿打印出稿。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虽然身处厄境,但不忘自己的历史责任,境况稍有改善后便着手工作,1972年12月12日记:“为了纪念西安事变,我今天下决心,从明年(1973年)1月1日开始,着手对《西安事变记》进行最后的修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修改,务期使它成为一本像样的历史书,预计在西安事变四十周年(1976年)前完成,以偿我的夙愿并纪念我故去的朋友们!这是誓言,不死决不改变!”父亲此时已是74岁的老人,几经磨难,病痛缠身,但他说到做到,从1973年1月1日到2月6日,日日伏案改稿,新年、春节两个节日,均未休息一天。父亲本着再现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

直书,真实地记录了瞬息变幻的历史真相,热情歌颂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不朽功绩。至1973年12月,三稿基本完成,定名《西安事变纪实》。此后,经刘鼎审查,又根据李克农、南汉宸、高崇民、王炳南、王菊人、孙铭久等人所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反复做了补充和修改。

1976年4月下旬,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造成口喑手颤,难于行动。右手不能写字,他练习用左手写,坚持修改《西安事变纪实》。1978年,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西安事变纪实》,他用颤抖的手艰难地最后地写下了“前言”。1979年,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父亲,在病榻上看到《西安事变纪实》校样时,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从1955年到1979年,整整二十五年,三次成稿,补充修改无数,终于完成了《西安事变纪实》的写作。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这里有他对理想——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执著的追求,有他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深切怀念。《西安事变纪实》于1979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资料,被收藏、被引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虽然现今写西安事变的书已经很多了,但从内容完整、作者亲历、写作严谨等方面来讲这部书仍不失它的独特价值。《西安事变纪实》出版近三十年了,父亲也离开了我们近三十年了,如今,蒙人民出版社关照,《西安事变纪实》得以再版,父亲英灵有知定会感到欣慰,为此,我们向人民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申晓亭 申 漳 申大京

2008年12月12日